

旷世大儒

朱

熹

朱汉民 萧永明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with a large, expressive ink wash painting. The painting depicts a figure, likely a scholar or a man of letters, in a dynamic, slightly twisted pose. The figure's head is tilted back, and his arms are extended, with one hand reaching towards the upper left and the other towards the lower right. The ink is dark and bold, creating strong contrasts with the lighter background.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emphasizing movement and form over detail.

旷世大儒——朱熹

朱汉民 萧永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世大儒——朱熹/朱汉民、萧永明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1
(旷世大儒)
ISBN 7-202-02816-6

I. ① 旷… II. ① 朱…② 萧… III. 朱熹-传记(1130—
1200)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332 号

-
- | | |
|-------|-----------|
| 丛 书 题 | 旷世大儒 |
| 书 名 | 旷世大儒——朱熹 |
| 作 者 | 朱汉民 萧永明 著 |
| 责任编辑 | 李大星 |
| 美术编辑 | 马少华 |
| 封面设计 | 李颖明 |
| 责任校对 | 张三铁 |
-
- | | |
|------|--------------------------------------|
| 出版发行 |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11.625 |
| 字 数 | 275000 |
|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4000 |
| 书 号 | ISBN 7-202-02816-6/K·689 |
| 定 价 | 18.5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 在 前 面

在 2000 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 2000 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利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使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说有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

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编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世间真伪有谁知	[1]
第二章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8]
	一、关于“理学”之名	[8]
	二、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12]
	三、理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16]
	四、理学的形成及其特点	[28]
第三章	求索终生 综罗百代	[35]
	一、求学问道 泛观博览	[35]
	二、议政讲学 著书立说	[52]
	三、罹祸党禁 著述不辍	[80]
第四章	致广大 尽精微	[96]
	一、天理流行，理一分殊	[96]
	二、性即天理 心统性情	[114]
	三、格物致知 知行互发	[126]
第五章	《五经》探幽 《四书》 发微	[137]
	一、朱熹的《五经》学	[138]
	二、朱熹的《四书》学	[153]
第六章	陶镕历代之偏驳 会归 一理之纯粹	[170]

	一、道贯古今 史分王霸	[170]
	二、史中求理 经本史末	[183]
	三、陶镕历代 会归一理	[193]
第七章	评诗论文 自成一格	[204]
	一、文从道出 文道一贯	[204]
	二、志为诗本 诗出乎志	[216]
	三、沉潜涵泳 以意逆志	[229]
第八章	议政言治 心忧天下	[241]
	一、重民尊君 强调纲常	[241]
	二、德治为本 以刑辅德	[249]
	三、倡言变革 重视人才	[262]
第九章	讲明义理 修成圣人	[273]
	一、明人伦为本	[273]
	二、“立志”、“居敬”、 “穷理”、“省察”	[278]
	三、学、问、思、辨、行	[283]
	四、读书之法	[292]
第十章	问难扬榷 有疑共析	[302]
	一、与陆学的学术论战	[302]
	二、与湖湘学派的学术论 战	[316]
	三、与浙学的学术论战	[338]
附录一	朱熹年表	[357]
附录二	参考书目	[362]
	后记	[364]

第一章 世间真伪有谁知

八百年前的三月仲春时节。武夷山下的沧州精舍内。病榻上卧着一位清瘦的老人，身边站立着几位虔诚的弟子。这位老人正在弥留之际，他就是道学大师朱熹。

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将近。他毕生以道学为自己生命的全部目的，认为“道”既是人文法则，又是宇宙本体，相信自己的生命早就和“道”连为一体，所以，他完全能够以非常坦然的态度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但是，在此刻，他仍然感到心中有许多话想说，只是已说不出声。于是，他示意用笔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当学生将笔置于他的手中时，他却已无力运笔。最后不得不将笔放下，安静地躺着，将想说的话留在心里，然后让自己慢慢地与浩浩大化完全地融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究竟还想说什么、写什么呢？

朱熹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文化的理念世界，一个是社会的现实世界。关于文化理念世界，他这一辈子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写了很多很多。就在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无几的最后几天里，他仍然在和学生论学，讲《太极图》、讲《西铭》；他仍然在写书，修《书传》、改《大学》。然而，他又怎么说得完、写得完呢？他毕生追求的“道”的理想，都已体现于那些讲学的“语录”、“讲义”中了；他毕生思考的宇宙大道，也都已保留在儒家经典的注释中了。他的思想体系是那么宏大而系统，他的学

术体系是那么丰富和严谨，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有必要再给学生讲一遍“太极阴阳”、“心统性情”吗？有必要再为《四书》写一段章句注释吗？

关于社会的现实世界，令他道不尽、写不完的事情也有很多很多。远的不说，四年之前突发的“庆元党禁”，一下子就使这位文化巨人卷入了政治漩涡。“党禁”事件发生后，道学被列为“伪学”，受到禁罢；道学家被列为“逆党”，受到清洗。作为“伪学之魁”，他自然承受着更大的打击和煎熬。他很快就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弹劾，甚至差一点遭到杀戮、流乱等严重的惩罚。无奈他不过是一个讲学写书的书生，在儒生士林中一向威望甚高，故而，只是在党禁的愁云惨雾中落职罢祠，来到僻静的武夷之麓，讲学著书，以度余生。作为一名被卷入政治漩涡的儒生，他自然感到万分悲愤，甚至曾发出“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的感叹。但是，对于朱熹这样一位道学大师而言，一时的政治得失、社会荣辱实在不应该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他既然将自己托交给了“道”，便已经达到了一种超越的形上境界。那些昏君、权臣以及势利之徒的迫害和鼓噪，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去理睬的。那么，他想说的、想写的，一定与这种现实的荣辱得失无关。他勿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向这个黑暗世界作什么申辩。

但是，我们又确切无误地感到，朱熹想要说的、想要写的，一定与这两个世界有关。因为能够使朱熹牵肠挂肚的，只有这两个世界。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曾怎样投入、怎样痴迷地生活在文化的理念世界之中啊！那是一个他与古昔圣贤一道创造的美妙世界，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热情、生命都献给了那清纯的概念辨析、温情的价值理想。作为一名忧世的儒生，他又必须生活在社会的现实世界之中，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理念世界去改造现

实世界，于是，他不得不面对那个黑暗的世界，尽管里面充满了权力网络的纠缠、政治陷阱的险恶、天下苍生的血泪。作为一代鸿儒，他和古代的那些圣贤一样，希望能够“以道易天下”，将两个世界统一起来，那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但是，他做不到。他无法用那文化的理念世界去改造社会的现实世界，对此，他有一种深刻的失望。他晚年经常表现出对道、禅的强烈兴趣，应该说是这种失望的表现。

那么，在这临终的时刻，他是否会想到，虽然他无法用自己的理念世界去改造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却可能会改造他的理念世界呢？也许这正是他所感到忧虑的问题，故而，就在他撒手人寰而去的时刻，焦急地想说一点什么、写一点什么，对他所创造的理念世界再作一点最后的陈述和说明；也许他对这个问题十分坦然，并不想再作什么辩解。还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学说就已经受到各个方面的误解，各种力量的进攻，他常感到无力辩解。在他的生命终结以后，现实世界再横暴地对待他的理念世界，他又能够作什么申辩呢？

确实，当朱熹最后因无力运笔而将笔放下时，他勿须再说什么、再写什么了。他创造了一个那样清彻、宏伟、和谐的文化理念世界，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文化使命，至于现实世界的是非毁誉，已经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事情了，他只需抱着“极知此道无终否”的信念，安然地与他的“道”化为一种永恒……

朱熹没有想到，在他身后，他与他的理念世界还会遇到那样严重的是非毁誉的难言境况——

他逝世消息传出，学界悲痛不已，许许多多的学者自发聚集起来，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这件事竟然引起朝廷的恐慌。《宋史》载：“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

从之。”^① 朱熹作为“伪师”，其学作为“伪学”，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和防范。他和他的理念世界还在继续经受现实的磨难。

但没有多久，“党禁”松弛，朱熹和他的学说开始受到推崇。宋宁宗嘉定2年（公元1209年），朱熹赐谥曰“文”，被称为“朱文公”。嘉定5年（公元1212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宋理宗宝庆3年（公元1227年），朱熹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3年（公元1230年），改封徽国公。宋度宗咸淳5年（公元1269年），朝廷下诏赐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阙里”，同孔子阙里，朱熹取得了与大圣人孔子并列的地位。

到了元代，朱熹及其思想继续受到极度推崇，地位不断提高。元仁宗延祐年间（公元1314~1320年），科举制度恢复，并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课试士子。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下诏兴建朱子祠庙，称“徽国文公之庙”，朱子开始受到朝廷的朝拜。

到了明代，朱熹及其思想受到进一步的推崇。明朝开国，即明确以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为统治思想。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便诏令天下立学，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均以朱熹等理学家的传注为宗，如学习其他“异端邪说”则一律不予录取。朱熹本人读了许多“异端邪说”方有其思想文化之成就，而后来的朱学门徒却只能读他一个人的著述！明永乐13年（公元1415年），以朱熹及其理学为主的三部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于天下，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景泰6年（公元1455年）、嘉靖2年（公元1523年），朝廷先后赐朱子后裔为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并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每年春秋祭祀二次，采用和孔子一样的祭祀制度。

^① 《宋史》卷429，《朱熹传》，中华书局1985年6月版，下同。

清代，朝廷对朱熹及其理学的推崇仍在继续。康熙帝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编《朱子全书》、《性理精义》，颁行全国并亲自为《全书》作序，称“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 51 年（公元 1712 年），又下旨将朱熹的牌位由文庙东廊移至大成殿，入“十哲”之列。

与此同时，朱熹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传播到国外。朝鲜的李氏王朝时代，朱熹受到了极度推崇；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朱熹之学亦成为官学……

极度的推崇、极度的张扬、极度的膜拜，这对朱熹及其理念世界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也绝非朱熹本人所愿。与这种极度相对应，不久以后，朱熹及其理念世界亦受到极度的批判、极度的否定、极度的诋毁。

明代是朱熹及其理学受到赞誉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他在身后受到批判的开始。这种批判首先来自理学内部，明代一批著名学者不满朱熹注重知识理论的分析、典籍注释的考辨的学术传统，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就称其学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人才愈多而天理愈蔽”。^①因此，朱熹在道统上的地位受到了怀疑和否定。他被认为是不但没有传承道统，反而是“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②

明清之际，朱熹及其理学又进一步受到其他儒家学者的批判。此时受到批判的，已不仅仅是他的学术主张，而且还包括他所倡导的伦理价值观念。被近现代学者合称为“淑世大儒”的颜元、戴震，均给了朱熹及其理学以严厉抨击。颜元说：“千余年

① 《阳明全集》卷 1，《传习录》上。

② 《阳明全集》卷 7，《别湛甘泉序》。

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者，皆晦庵为之也。”^① 这还只是就学术而言，更为严重的是批判其天理论“杀人”。颜元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是王学，不杀人耶！”^② 他认为朱学、王学的“存理灭欲”说皆是“杀人”的理论。这个观点，在戴震那里表达得更加充分，他认为朱熹的天理论已经成为“忍而残杀之具”，“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③ 这是何等凄冽的呼喊和愤怒的斥责！

近代以后，对朱熹及其理学的批判和清算，更是一次次推向新的高潮。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代代革命家、批判家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以激烈的态度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并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他们传承戴震关于宋儒“以理杀人”的控诉，发起了对朱熹及其理学的更加激烈的批判。从谭嗣同到邹容、陈独秀、吴虞、胡适，批判理学成为他们创建新思想的前提。如谭嗣同批判说：“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④ “程、朱则荀之云桀也，君统而已，岂足骂哉！”^⑤ 他们均是将朱熹及其理学看做封建等级制、君主专制的顽固维护者来加以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的。

这就是朱熹及其理学的命运！

确实，朱熹再也无法对他身后的历史说什么了。他只是一个

① 颜元《颜元集》，《朱子语类评》，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同。

② 《颜元集》，《习斋记余》卷6，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④ 《谭嗣同全集》第301页，《仁学》，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同。

⑤ 《谭嗣同全集》第339页，《仁学》。

儒生，一个热衷于思考的思想家，一个酷爱知识的博学者。自从他创立了自己的理念世界并撒手而去之时，他就无法再作什么辩解了。此后，一代代君主将这个理念世界撑上了天，并以此作为专制皇权的护身符，他只能无奈地看着那一切非他所愿的事情发生。同样，一代代血气方刚、口舌锋利的青年学子将批判的利剑插入这个理念系统的时候，他也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那一声声的怒吼。

朱熹应该对他的理念世界负责。但是，他似乎又无法对现实世界改造和利用这个理念世界的后果负责。

历史的香火与战火已经凝聚成越来越浓重的烟云，遮蔽着日渐久远的人物、思想及事件，以至于现代人已经难以看清这位道学大师的真实面貌。我们力图通过撰述本书，澄清这些烟云，尽可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个历史人物和他的理念世界来。这是我们的基本愿望，也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第二章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朱熹是与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载入史册的，要了解朱熹，就不能不首先了解理学。本章着重论述理学的名称及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概述理学的主要特征。

一、关于“理学”之名

“宋明理学”是现代治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的学者对宋明时期的断代思想史、学术思潮的一种通常的称呼。但是，亦有的学者将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称之为“宋学”或“道学”。与“理学”一样，“宋学”和“道学”均是历史上曾经比较流行的一种称呼。由于它们所指称的对象有着大量的重叠，所以人们有时易将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其实，这些名称在历史上各有其特指的涵义，故而指称的范围有不重叠的地方，需要作一些辨析。

首先看“宋学”。“宋学”之称出现于清代。清代的经学家将历史的上的经学分为汉学、宋学两大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提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